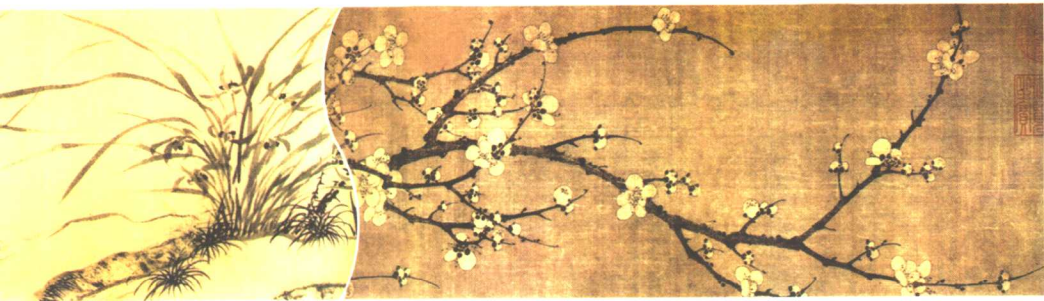


论语札记

Essays Concerning the Confucian Analects

論語劄記

牛泽群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论语札记

牛泽群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语札记/牛泽群著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03.12

ISBN 7-5402-1572-0

I. 论… II. 牛… III. 论语—研究
IV. 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4251 号

·
论语札记

牛泽群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 18.125 407 千字
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册

定价: 28.00 元

序

《论语》被称为中国第一书，不仅仅是笼统古今而论，或是由时间加权平均概出的。今天，或隐或显，实际上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方面，如果我们要了解历史（历史是今天的后窗，不由观，就不能明达。古人说“数往知来”，甚至把历史看作未来之牖），那么，中国历史的主要成因、古代思想史的主线、政治文化的基调和框架、整个是非观、善恶美丑观、荣辱观、进退观、成败生死观等等所组成的人生和社会观念体系等，都渊源于它或与它有密切关系。没有别的任何一本书堪备这样的功能，不读，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和理解历史，不能洞晓今天种种的前身和源自；另一方面，今天我们头脑中的观念，究竟还有没有、有多少是辗转曲折因承自它呢？可能我们自己习熟无察。现代遗传和社会学研究揭示了决定一种文化的两大基本因素：基因和环境。人的思维方式、趣尚倾向、选择特点等，同性格一样，具有一定的个体遗传性；而社会观念，亦隐伏地具有独立的群体遗传性。《论语》这部书伴随和影响我们的祖先这样深且久，历百代治、乱而不易，其中既有选择和适宜的因素，又有被选择和施诸的因素，那么在社会改变并不能称为历史上的许久之，后，这些因素有多少以某种方式遗至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呢？这其中又有多少是残缺地表现出来，有多少是隐着于我们身心的呢？可能随察即见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，时间的积重，暗沉无形得令人叹服：历时若干年要改变、革命的，是数百倍久之于其固在的东

西，犹如刚性之于柔性，力越猛，虽去之越快，但部分位移俟后反弹越大，这其中有些是我们所经历和看到的。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，世界上弥历封建专制最久的民族，在今天种种现代化趋从下，民主化的进程仍然最被需要稳健。这样一个民族的后裔，许多人第一次读《论语》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实际这不过是表层而已呢；再一方面，《论语》中的思想、智慧、哲理、方法论等，很多可以径用于今，所谓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重点个人修养、学习、人生、处世、道德伦理等这些尚不论，我只举另一类型的例子，它说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（你）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又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又有执政者因患窃贼流行，请教孔子，孔子用他特有的冷幽默犯颜直刺：“苟子之不欲（贪欲），虽赏之不窃。”这些对于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政治腐败、义理曲录，不是亦如一根明晃晃的、可让立即溅血的尖针么？一些理论家、大小官员、舆论家、帮从们也整天在喧嚷反腐倡廉，产生原由，如何防治云云，说辞成套，理论铺天，不是可以借用一句旧话：此一句顶彼一万句吗？此一睿智照见彼真、假糊涂百千万吗？你能说《论语》、老夫子早已过时，朽矣，时代已发展前进巨变，已然高明出乎万丈了吗？

但这并不是说《论语》净是精华，某种意义上可能正相反，它的思想总旨是保守的、反动的，两千年来它始终与封建专制相守互爱证明了这一点。但以今天角度看，《论语》的糟粕与它保守反动的东西决不应是物理量上的相匹，这不仅因为它的释义在封建体制下、在孔子至圣先师地位之下，被累积式地、自然与非自然地曲解了很多，别扭了不少，对它还原的过程，是去“精”还“粗”的过程；更主要是因为，它主旨的反

动性对于后世和今天而言，与对于当时社会背景下，特定的功用初衷而言，不是等侔齐侔、一言可概的。它保守中的进步或原发性的开明、进取中的曳娄或幽旨的固守，相对与参定物是立体的、活于当时而尘影于今的；它就人的本性、人际基律的发现、认识，以及人格精神的开发，则基本上是绝对的、恒常不易的。这两者间，即使再简断，也不能说是互依、同向和俱然的关系。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他所立之于顶的峻峰，也许直入地岩，也许断层托之于山峦。但世上没有一座高拔的峻峰，是孤峭陡耸于平川，而不带及并峙植于巍峨迤邐的山岳的。孔子的政治、伦理学说，我们读味时愈不先尊或先卑而主、愈不带政治观点——易佚的、着色和褪色不定的介质——才能愈见其中恒绵的价值和益于我们思智的东西，也才能愈深入准确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和我们文明的兴化历程。说到历程，我们确像柏拉图“洞穴之喻”中的囚徒，那些转过头来的和走出洞穴的只应有正确感而不应有高明感，因为前者仅仅是体验维度的这样一种变化，至少对于任意个体和有限个体之和而言，其与体验方式的调整和求索无关而只是外在因素施加的必然反应。我们不应在转过头来后就嗤笑、贬抑面壁的种种，除了幸运之外，还应怀疑是否还有更高的境界。果然，到了阳光下。这时继续的怀疑更易被中止，很少有人不认为这就是止境，于是自锁、愚昧就此而生。如果我们承认分辨洞壁上的影子，比阳光下识别形相困难得多，需要更过硬的技巧和智慧，并承认凡智慧都是相通的，那么走出洞穴的人客观上必已潜移、主观上尤不应失弃那些智巧之晶。一个所谓的崭新的人，必是一个十足的蠢人。亦即尽管认知方式的状态是不可逆的，我们不再需要原来的体验模式及其智巧系统，但就如同淘汰一种落后的老式

汽车，岂是把它连同车型、所有零件的设计一起淘汰掉？明白这一点，但可以挖掘《论语》的思想、智慧中的精华。

各个历史时期对待、视遇《论语》的嬗演流变，以及诠释之间的微妙变化，恰是一部中国思想、政治变迁史的侧写。这里把它们归纳为十个时期（部分）：

（1）战国诸子思想都与《论语》有某种关系，受它的影响很深。并不是它在那时即有独尊的地位，汉代以来的“公论”，从元始上就不把孔（孟）与诸子相提并列，宁空白一段历史，或虚造妄说，探实成为自动的禁地，直到“五四”前后。实际《论语》当时的地位完全是作为一家之说与其他相平等的、自然的、甚至是受攻抑最多的。但它的影响力和受重视程度超过其他诸子，这是由于两个原因：一是它成于战国初期，尽管早期流行状况和与今本内容差异上尚不甚明，但作为诸子之先，《诸子》之首，影响力是别子乏埒的；二是它的思想与当时传统吻合最多，一定程度上成为诸子欲立而要先破的表的。所以甚至可以说，诸子的产生，都是以对它各种方式和程度的或奉扬，或反对，或修改，或参照而另兴，来分野以成的。比如墨子先是而后非之；子思、孟子奉扬；荀子奉而修改；《老子》不像《庄子》那样明面上能看到反对、贬抑，而细析则很多；杨朱之说，因为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”，使不知其详，但这一派的前驱，在《论语》中所数见者，竟都熟知并攻诋孔子主张，可见遁世还是以《论语》的入世为反面参照的；名辩家之说，则导源于《论语》的“正名”；韩非又奉而修改荀子，间接影响之外，又直接攻斥，以申证己说，等等。（所谓百家争鸣，那种自由、热烈、一派天机、极富文明创造力的氛围，是多么令人向往啊！）司马谈《六家要旨》误于浅简地以“一致

百虑，殊途同归”概论诸子百家的宗旨和目的，并基于此而统论六家长短；刘歆《七略》论诸子起源的错误，除了出于王官论这一迷谬之外，还在于他过分强调诸子起、立的平行性和独立性（胡适在驳章太炎《诸子学略说》的发挥刘歆理论时，没有涉及到这一点。）二人说中，唯独依稀隐约的“平等”色调，是难得尝有的。其错误的共源，是对于百家争鸣的后来之惑，淡视其质，洼视其价值和意义，无视作为争鸣的要素：相互正反面影响、相互渗透、促进，更不要说发现《论语》在其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了。当代的冯友兰等没有跳出刘歆肇造、清代章学诚、民国章太炎继扬的理论谬说的轨辙，布广流深成“五四”后的“公论”。这是不能以矫枉过正为释然的。

（2）汉代以始不能再复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其罪不在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它只不过是封建一统专制这一根本性原因的表层体现，以及具体形式的标志罢了。汉武帝之前长达一百二三十年，历四帝，这期间也废除了秦的挟书令，也有儒、法的互攘，也有崇尚黄老之后的儒、道之争，但是即使再经二百年，也不会恢复，更不会发展出新子竞起，新说争鸣。至于汉武帝这政策性的“一尊”竟延后而为民族基本价值观“定于”如此之久，这“具体形式的标志”中的偶然是完全役于必然，还是一定的偶然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必然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发展，天赋命定般就是要包括“一尊”在内而成这个样子，还是“一尊”牵着鼻子不会走成别的样子，我基本主张后者。但有时有彷徨，比如思及佛教东渐中国，比“一尊”迟不过二百余年。现代学者认为宗教的影响和渗透力远大于道德伦理说教，但佛教的教义一遇与儒学相背处，便立即屈从改易，如原旨宣扬的人与动物在轮回中互更为父子，竟被“演绎”出孝道来。

最终佛教没有在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，而儒学不仅没有削弱，反而向更强硬的礼教方向发展。这些有的是很难解释的，还有别的例子。也许思考未果，才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源泉吧。

《论语》在汉代经学家那里，至少也在初期受到了皓首穷经的自我愚弄，以及今、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，但比起“五经”来小得多。前者因为虽经秦火、秦制之后，文字、名物、完整性、版本差异等问题很多，但比起如《尚书》的“周诰殷盘，佶屈聱牙”等，则好之甚远；后者则因孔安国所传《古论》与齐、鲁《论》三者间的率同率，非如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等壁现异文衍文，及东汉时冒出来古文经籍之类者所能为乱。《论语》在汉代真正的遭遇，在西汉是受董仲舒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神秘论学说的作践，在东汉则是盛行泛滥的谶纬神学的奸污。今天所见的《论语》汉注，已经是被遴选出的少数几位经学大师们的被遴选的注作，甚至也能偶见到这两种痕迹。今见的孔安国、包咸、马融、郑玄等人各不完整的注作，基本都是简洁、平易、直接而非引经据典式的训诂，它们之中始终为后世至今所用或参照的，约占《论语》的十之六七。这与近古识真的事实相符，实际上也是《论语》可信度的一个保证。

(3) 魏晋兴玄学、崇老庄，这种思潮在这时期传今的《论语》注本，玄学宗师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中，被反映出来。何晏此书有两个宗旨，一是整理汉注，遴选精家精华，抑止阴阳五行、谶纬之说。《论语集解》成为保存汉注的最大功臣，很可能是由于至东汉滥说遍地，良者极易随莠者昙花而没，无意中成全的；二是何晏选汉魏八家注之外，自注小部分，宣扬了他的“贵无”的自然主义论说。后儒特别是清儒，不见前者之

是，不念其功，或以为理所当然，或以为精华即是一般，反有人疑其篡改汉注；对于后者之非则大加挾伐，往往过之。其实魏晋正统何易尊儒？尽管因一班名士们的狂热而带成风气，但至少表面上玄学不会替易正统尊位。何晏以魏吏部尚书之身，与几名高官重臣作《论语集解》，上之朝廷，不可能偏离过多。那一小部分中也只有几处显见异辞，与其说宣扬，更不如说没有按捺住，总之既不能与他的玄学著作相提并论，也不能说他援道入儒使《论语》老庄化了。这一涉前及后波折的特征，即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倒是南朝梁皇侃为何书所作的疏即《论语义疏》，杂引各家言，斑驳儒、道、释、阴阳、占术等，显得不醇得多，然而受攻抑却少得多。

(4) 唐朝皇帝既尊儒，又好佛，也尚道。大唐帝国的强盛和气魄，与其对外开放、对内少钳制，有某种互为因果、促进的关系。这使得文化多元化兼容和思想自由度，达到了一定难得的程度，文学、艺术也因此繁荣、兴盛，达到了高峰。从李白、杜甫等诗中对孔子赞誉、讥讽并见，随意无拘，即可例见尊儒之尊，既非比汉时之独又非如后世之特的一般风气。所以御命官注的有五经、史书等，而无《论语》；注五经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新兴的科考（九经），实际同御命译佛经类似，更主要的作用是使更好地成为繁荣所需的、多元文化的一部分。作为思想史上一个可提及的明显之处是，不像前后其他朝代，《论语》私人注述，也无人有热情为之。唯一一本据说是韩愈及其学生李翱所作的《论语笔解》，至少从风格特点上鲜明地反映了坚排佛、老，力扬道统的一代大儒的忿世疾时、急功近利：自专而生硬地注释，武断而近粗暴地疑改原文。

(5) 宋代的情况则大不同了，理学的兴起，使儒学达到了

某种高峰。《论语》的地位及其义旨的发明、发挥，在朱熹作《四书集注》前后，达到了空前的、韩愈甚至梦想不到的程度，并一直在后世延续、复加。《集注》并非实“集”，多是引一句如“程子曰”这类北宋理学大师的话置于己注之后。朱熹在汉注基础上，认真研究，精心揣摩，确实改正了许多汉注的误、乏，充实了许多新的发明，当然误改、漏误、新误也有不少，但终旧学之底，再没有能出其右的雅俗兼顾之作，所以始终为后世不易的塾教范本和科考题库。

一个矛盾是，清代大张旗鼓地排斥理学、抑宋扬汉，为什么不易《四书集注》的地位，反而有所加强呢？这里面有三个原因：其一、朱熹虽已深涉门户之争，但其学说远未达到宋明之学后期一些偏激的程度，如果有人按偏离“中正”排序，他肯定列后部。朱熹作《集注》，不专为借以载己说、争长短，似乎眼光很长，收敛较多，所以相对平易，又将理学观点尽可能地融合于原文，对比《朱子语类》四书部分大谈“理”、“气”，就可明显有此感。有清儒攻击朱熹满篇塞进了《论语》原本并无的“理”字，是夸大溢恶之说；其二、清代贬宋复汉主要是学术界、方法论范畴的事。清标立的朴学即考据学，与通俗幼学《章句》类读物之间，没有时间积累成果是难以搭界的，况且由雅而俗，降价折沽，岂是儒士们易为的事？其三、也许是最根本的，满清皇帝讨厌的仅仅是宋明理学那种聚徒讲学、派别林立、论辩争讼的形式，担心由此滋生思想活跃，给他们的统治带来危险的萌芽。而对于理学的内容主旨，尤其是程朱的学说（极至为“存天理灭人欲”），喜之不及，怎么能反感呢？纪晓岚等奴才心领异族主子的意旨，将贬斥理学的形式与实质在修《四库全书》从头到尾中，贯彻得很清楚，庶几与

钳口、文字狱等相为表里。这与顾炎武在清初针对理学衰微堕落成虚疏无根、侈谈心性，反其道而提倡实学、提倡直接反求诸古经所开的朴学先河，初衷和目的是完全不同的。理学渠魁之作，在讥屑诋丑理学的社会中不减盛行，反过来说，即为一证；《四库全书》借征、修之机，毁书毁板三千种以上，篡改更不知多出多少倍，诚为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有预谋的文化浩劫，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比之不过小巫，只有文化大革命才免为俚偕，但理学古籍却并未毁禁一本，删篡未及一字，又是一证；清朴学成就最高的巨匠戴震疾呼理学以“理”杀人，然自上而下，和者寥寥，而有清基于程朱理学的“礼教”，最终却尤森然于宋、明，更是一铁证。

(6)《论语》在清代的地位，超过历代。乾隆曾说，开科取仕，“四书五经”，重点在“书”。既异于汉代“孔子之术”附比“六艺之科”的提法，也高于宋明书、经的并重。而“书”中，不言而喻，以《论语》为首，清著《两汉三国学案》等说得很明白。《论语》并诸经、子之治，温顺、圆满地按满清人主的意愿，进入了不涉义理探求发扬的朴学之轨。清代朴学之于《论语》，约略有以下几点：其一、贡献巨大，因为它是死学，价值少有时代性，与理学各走一极端，所以与其无思想作用于当时之况反反而正，几乎能全为我们今天所享用；其二、工作量之大、涉及面之广、参与人员，特别是一流学者之多，使其在旧学方法和领域之内迫抵穷尽；其三、《论语》研究的高潮，与朴学总体的高潮不同步，或说相反。清初只有毛奇龄、阎若璩稍可称道；乾嘉鼎盛时，并无《论语》研究力作，惠栋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等只是在其通学中顾及，戴震、戴望的《论语补注》流布很差，少被称引；到晚清刘宝

楠、俞樾等人的擷秀揭厉，才达到顶峰；其四、不能全就《论语》研究专著而论，在朴学家笔记或其他杂著中，往往数条甚至一条偶发，最是干货，最有见地；其五、多数学者突破排宋尊汉方法论一度带及的内容倾向，不是以订误《四书集注》为首务，而是从汉孔、郑，到宋朱，有误即订，有遗即补，有暗即明，有不及或过即中之。一般方法严密、公正，学风共养，追求达到不留容人有辩讼余地的境界为尚。这体现了考据学必以实事求是、摒绝主观之成见为前提和基础的本则。在这之下，才进而有疑古派；其六、以崔述为代表的疑古派，是朴学之于《论语》、经学的闪光点之一。崔述不但疑汉人之误，还疑汉人之伪；不但疑外围，还疑原文本身真实性；不但疑无据的事，还疑前人久决铁定的成说；不但疑，还做了大量考据以证。其立疑，尽管拘于“一尊”狭限之内，以今天看有可笑之处，甚至有讳圣迂腐之加，不能与“五四”新疑古派同日而语，但足谓旧学的突破、学风的变源，俞樾、刘宝楠不受此溉沾，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成就。

晚清康有为的《论语注》不属朴学，他反汉学；但更不属他亦反的宋学。他受近世西方思想影响，欲开新学，以替二者。康有为的主要学术思想一是重燃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旧火，诋非古文经为伪，但新意是以此来动摇自东汉至清学的传统；二是认为“托古”是自古以来的普风，从孔子开始，“六经”实皆孔子所作，以托古改制。他的学说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，这是得；而其失，也很明显，就是学风较差，蔑视严谨，惯以武断。他的两部主要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，妄用“考”名，根本就不是朴学那种像孤证尚不敢立论那样严谨的路子。用“论”为名，也不足以稍释他随意歪解证据之

病。《论语注》又不同于“论”，所以失得更显。好像他在论述之间自己被传上了托古风，他的反封建专制、欣赏的西方民主，直至共产主义思想，都被他在《论语》中“发现”、“挖掘”出来了。所幸康有为的革命精神和伪劣学风，被后世分别继承或反袭，且往往消长相系；而俱承和俱反的则罕见。

(7)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引进西方近代思想和方法，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旗震荡传统，同时冲刷旧学，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和进步。

有人对“五四”的矫枉，包括打倒孔家店新有微辞，提出反思云云，甚至有人无聊地考证说“五四”期间并未曾正式提出过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。对这些人，可以一言以蔽之曰：蠢陋。大言之，不反孔儒，怎么反封建、倡民主制呢？难道再用康有为之法去接轨吗？中言之，不去“一尊”，怎么有学术平等、思想自由呢？小言之，不打烂圣坛，置之于地而后立，还其平易、真实的本来之身，怎么去发现它真正的价值呢？

有人将“五四”运动的主题重定有“爱国”，是不准确的。德先生、赛先生，无论当时的呐喊，还是以后的平议，一直就是这两个鲜明的、实质的、最具代表性的主题。爱国是一切民众自发运动的前提，不宜提作某一次的特定的主题。即使另有用意，也不应明改历史。

有人误以为“五四”打倒孔家店是涤荡式的，即真的被打倒了。其实就是在文化界，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性，更主要体现在它的高度活跃和爆发式的繁荣上，保守的、折中的、游离的始终仍在，今天的某种复苏，或可看作其绪。而文化界之外，正统仍然是尊孔，国民政府仍年年大肆祭孔，直延续到台湾。

“五四”至49年这期间，尤其是中后段，本应该，也最有

条件产生《论语》研究的新作了，因为：其一、一旦去“尊”，突破旧观、旧律的框囿，新的认识便立即俯拾皆是，应集拾辘众；其二、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输入，堂庑阔大，比如古代社会考察、形式逻辑、哲学分析、考古结合法、比较研究法等，都是旧学所无，必会带来新机；其三，新文化运动给语言学、文献学、历史学、思想史学、伦理学、科学与经济史学等带来的累累硕果，都可以也应该为用。但是却没有哪怕是一部专著问世。可能要做的事太多，尚未轮到吧；也许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有避此欲打倒者，以免惹嫌的私心吧。

(8) 49年至八十年代，左倾思想支配下的，则无胜于有。唯五十年代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大胜于无，尽管此书问题不少，主要是：一、通俗性强，研究性弱；二、摭旧说多，采新成果少；三、明显硬伤性错误时见；四、着力不够，用功不多，故不可谓精湛。尽管如此，也还是自有它的明处和长处（拙著在这两方面厚长薄短地都试图例举出了），难得的是此书竟能不带左倾色彩，所以它至今几乎无替代者。如果必说第二部，那就是赵纪彬的《论语新探》，有人把它归为批林批孔时代之作，是不公正的。此书尽管颇有迎合之意，但毕竟是考证为主，总试图以理信人，而且早出于前，与批孔期间他的另外专作不能等而同视。

批判孔老二时期各种“材料”时作，包括杨荣国氏、冯氏之作，就不提了，连同它所侧写出的那段思想文明践踏史。

(9) 这期间大陆之外港、台等是怎么样的呢？台湾似乎一直不断有《论语》注释本出版，但如果以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的《四书道贯》稍为代表的话，那就糟了。翻阅此书，只见迂腐竟胜出古人，又杂有康有为的牙慧，而智不充旧塾之师；抱

残守缺的顽固，仿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仅仅是给他带来了新式标点的采用而已。读到这样的狗屎之作，也可以侧见当时国民党专制、僵化、禁锢之一二。

钱穆的《论语新解》被一些人称为善本，有较大影响，可能一是因为钱被称为国学大师，二是此书率同时于陈著，但明显没那么顽劣。从遗风上看，陈书的说教方式偏宋学，钱书平易中透出的风格仍是清学。但以我读到过的钱先生的著作看，《论语新解》应该是其中最大的败笔。钱著有一个特色，不提时人一字，则更不引一语，唯埋首故纸，但其实还是采纳新思想的。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就是前辈清学家们在重经轻子、经子不同提并论的铁规铜俗下，不可能成就的。所以钱先生按旧式治学，却能以莘莘大端拓延朴学已题无剩义、碎义难逃的穷途，实在有赖于虽看不见的“新”。但《论语新解》的“新”，却只是体现在旧说的“白话”这一新形式上而已。书中多还并列一些旧说，其中有前人早已吐弃的，却在“一说”、“或说”平易的话之后，往往并不加辨析，甚至排序前后也无倾向性，只在下面“白话试译”的采用上，主要来表明此书姓“钱”（极少的明见，拙著多指出，以成人之美）。个别的议论，常让人怀疑与《诸子系年》的明辨（谬误是次要的），非出于一人，比如《乡党》末章，悖理不让陈氏，肉麻竟出古今（详拙著该章）。

1976年始于台湾的南怀瑾的《论语别裁》，又是另一种情况，迂阔、陈腐、谬误、悖理，一应俱全，但却换以轻松、更通俗的形式；毫无明辨、透见、新获不必多怪，但新添的唬人的玄说、夸诞，以及隐约的神秘（如谓《论语》编排如何严而有序，详拙著《公冶长》篇部分），则呕人；另一大特点是东

拉西扯上一些最多只着半边一角的古今杂谈，更像是以《论语》文强为引子的蹩脚的海聊神侃大杂烩。此书先台湾、后大陆连印畅销，除包装炒作的成功外，足见中国大众文化的落后、辨别能力的低下，以及青年的易被欺惑，后者尤其令人触目惊心。

(10) 八十年代之后，随着两岸不同程度的学术开禁、思想解放，主要是对古代文化研究的更大的自由度，这一领域华人界论撰渐趋同。好像台、港已是退祛下的《论语》热，复烧于内地。从图书馆中查阅目录，可见到这时期以来新出的有关《论语》的书约近百种之多。我并没有故贬时作之意，但确未能见到一本佳作。不敢说抄袭风盛或悉浅薄寡要，因为远非见全。其中略见有立意争鸣，力求创获的，则净悖陋之失。欲为《论语》新作，深入辨索，有所发明，应该有基本的训诂能力，起码了通历史，稍精于东周史、先秦思想史，至少通览“五经”、主要的周、汉诸子，对于历代主要的《论语》注疏、研究著作，包括散在别书中而重要的，既使不求遍读，也应及至有代表性的，并精读，“五四”以来古代文化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，更不能遗漏。具备这些的，今天仍有不少人，但恐怕其中精谳的，越已精力不济；相反，有心为之的，恐功力不达（就象我自己）。关键之处还在于，必须客观、公正、诚直，不囿成讳、不失风骨、不怯求索，同时必须倾注大量心血，深入细致地研磨。刘宝楠作《论语正义》、焦循作《孟子正义》，都是父仆子继，甚至子仆又继的。现在这些精神的缺乏，实际远比旧学功底的缺乏为甚，代之而有的，是轻浮、却任、浅躁和商业化，形成了一定的恶性循环。但我是反对孔子厚古薄今观点的，相信今后必会有力作问世，超越前人既往，进取创阔，